

外部勢力非議「佔中」案判決是雙重標準

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對示威集會中非法行為製造者進行拘捕和懲治，而香港法院依法判決非法「佔中」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，就成了「懲罰和平的政治異議」呢？就是「用上了過時的普通法控罪」呢？這是什麼邏輯呢？這不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嗎？

黎子珍

非法「佔中」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等9人，被控在「佔領」運動中，就煽惑公眾妨擾等共6項罪名，9人分別裁定1項及2項罪名成立。香港反對派、末屆港督彭定康和外國勢力，異口同聲以所謂尋求復仇、打壓言論自由、撕裂社會、普通法控罪過時等謬論，攻擊和抹黑香港法庭的判決。

對香港司法制度不尊重

彭定康聲稱，在大多數人認為，香港政府應團結社群時，卻用上了過時的普通法控罪，對2014年發生的政治事件尋求復仇，造成令人震驚的分裂。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發表聲明，眾議院議員 James P. McGovern 及美國參議員 Marco Rubio 表示，「佔中」9人被判罪成，是懲罰和平的政治異議，縮小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空間。德國國會人權及人道救援委員會主席 Gyde Jensen 表示：「令人震驚的是，爭取人權活躍人士和民主派領導，在香港的風險愈來愈大。我們不能接受抗議者在行使言論自由與

和平示威時受到恐嚇。」行會成員、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批評彭定康說判決是利用過時的法律向「佔中」人士報復，是完全曲解了法律的定義，也是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不尊重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表示，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，依法懲治非法「佔中」主要組織者和策劃者，如果有任何其他國家的人士，片面理解判決為損害社會，屬於毫無道理及毫無根據。陸慷表示，當年持續79天的非法「佔中」，嚴重衝擊香港法治，嚴重損害香港社會穩定及公眾正常生活秩序，如果有關情況，發生在任何國家和地區，相關政府作出任何切實維護公眾正常生活秩序的決定，無可非議，他認為批評者只要留意其他國家發生的情況，就可以有更公正的結論。

歐美不容許違法佔領行動

例如，2011年發生的「倫敦大騷亂」，嚴重影響英國營商環境和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形象，造成大量人員傷亡，英國政府以鐵腕嚴懲暴力活動參與者。英國警方逮捕了至少2,952人，被起訴者至少1,774人，317人被判刑。同年美國發生的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，也受到美國政府的嚴厲鎮壓。當示威群眾佔據行車道以致影響交通時，警方立即行動，當場抓捕700多

人，事後有20人因擾亂治安而遭刑事指控，當中一名參議員的助手更被判監13年。

法國曠日持久的「黃背心」運動，示威者在巴黎香榭麗舍大道放火燒商店，沿途不少商店被毀壞和搶掠，法國政府派出軍人維持治安，逾1,700人被捕。

這顯示，英美法均不接受「佔領華爾街」、「倫敦大騷亂」、「黃背心」運動，以及採取暴力手段擾亂社會治安，是所謂「公民抗命」運動的說法。FBI更稱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是「恐怖主義」行動，並以對付「恐怖分子」的手段對付參加者。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指「倫敦大騷亂」給整個國家敲響了警鐘。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呼籲法國人要站出來對「黃背心」示威暴力說不。這說明歐美等民主國家，也不容許違法佔領行動。

為何不見彭定康出來說英美政府用上了過時的普通法控罪，對政治事件尋求復仇，造成令人震驚的分裂？為何不見美國反華議員對美國政府鎮壓「佔領華爾街」運動，說成是「懲罰和平的政治異議，縮小言論自由與和平集會的空間」？這不就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嗎？

別了，敏剛兄！

胡曉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



日前收到文匯報邀請撰文懷念王敏剛兄，讓我再度回憶起這位老友——「皮蛋王」，憶起我們相識40多年來的點滴。記得在上世紀70年代中，我剛從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畢業回港，其時幾位學長發起重新成立香港校友會，凝聚回港的畢業生、加強聯誼，其中一位學長便是王敏剛。我是在校友聚會中認識他，因為當時我是「新人」，受各學長所推舉，負責召集校友舉行聚會。

爽朗隨和 志向堅定

當年我們一同探討世界時局、尋找發展機遇，並嘻嘻哈哈共度不少愉快時光。朋友間喜歡互取花名，王敏剛英文名 Peter Wong，大家為他取名「皮蛋王」，他為人不拘小節、爽朗隨和，對此花名亦欣然接受，故老友都暱稱他「皮蛋王」。

我和王敏剛大學時期在美國都修讀工程，大家談起工程亦志趣相投。我主修電機工程，他修讀的卻是極為冷門的船舶設計。當年香港很少人認識造船工程，出路非常狹窄。因此，我對他的印象特別深刻。他是一心學成回港協助其父、有「香港船王」之稱的王華生先生打理造船業務。我敬重他的孝心，也佩服他能夠堅定自己的事業目標與志向。

至今我認識的朋友中，即使工程界的朋友，亦只

有一個擅長船舶設計專業，他在香港可算是少有的專門人才。

除了是校友，我家與王家也是世交。我的父親胡法光與王敏剛的父親王華生先生因體育而結緣，一同服務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多年，兩人不時有交往，既在公務上經常碰面，也是商業上的夥伴。

王敏剛是一名熱愛香港、關心國家的實業家，在專注香港的事業外，亦積極投資內地。我們在國家改革開放初期，已分別到內地投資，我的投資主要在上海、江蘇等地，他則投資廣東、北京、西北偏遠地區等，更是首位港人在當時較為落後的甘肅敦煌投資，斥資1.5億元人民幣建設當地首家四星級現代化酒店——敦煌山莊。王敏剛無懼困難，推廣當地的旅遊與文化。

為國為港 盡心盡力

2005年，他看準江蘇省蘇州文化資源的發展潛力，邀請熟知當地民情的我，共同合作發展平江客棧酒店項目，將兩座傳統古老大宅改建為特色酒店。我發揮在當地的人脈網絡優勢，他則善用自己在開拓文化資源上的豐富經驗。記得當年，他對改建工程細心謹慎，親力親為挑選最適合的裝修材料，最終成功展現中國古老的建築特色及典雅文化，可見他辦事認真，事必躬親。

王敏剛是商業上值得信賴的好夥伴，亦是公務上的好同事。1992年我獲邀聯同霍震寰、王敏剛等共同創辦香港青年聯會，團結眾多本港不同背景、不同階層的青年，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動，為自身、為香港及祖國的未來發展作出貢獻。

2002年至2012年，我與王敏剛均擔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，每年多次在北京碰面；他自第八屆至今連續6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，亦是港區人大代表政法小組召集人。我6年前當選港區人大代表後，與他有更多共事機會，共同探討有利香港與國家發展之良策。

在我眼中，王敏剛待人友善，為人謙虛誠懇，做事勤力盡責，願意提攜後輩、聽取他人意見。他一生熱心服務社會，在身體抱恙下仍堅持由香港隨團前往北京參加今年的全國兩會，履行人大代表職責，其認真的做人態度可想而知。他不只愛國愛港，更為國為港盡心盡力、出謀獻策。

對於推廣國家的旅遊文化，王敏剛不遺餘力，經常邀請朋友到訪他在內地成功開發的文化資源項目。最遺憾的是，他曾多次邀請我到敦煌參觀考察，入住他的敦煌山莊。可惜我因近年公事繁忙，至今都未成行，現已成為一大憾事，再沒有機會與「皮蛋王」共遊敦煌。

反對修訂《逃犯條例》 重演「逢中必反」鬧劇

穆麟

修訂《逃犯條例》一事，近月來鬧得滿城風雨、沸沸揚揚，令人錯愕。

此事之來龍去脈，其實十分簡單。一名香港男子與女友到台灣旅遊期間殺害女友，該男子逃回港，因港台並無移交逃犯安排，於是出現殺人者無法入罪的怪現象。

如果法律不能懲惡揚善、彰顯正義，法治就淪為空談。如果政府不能保護好人、懲罰壞人，那麼這個政府也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。特區政府決定出手修訂逃犯條例，將移交逃犯的地區擴展至包括內地、台灣和澳門在內的所有暫時沒有和香港簽署協議的國家和地區，以徹底堵塞法律漏洞，不讓香港法治之都的金字招牌蒙塵。

但萬萬沒想到的是，荒誕的事情出現了。一小撮人竟然扎扎跳鼓動反對修例，不單止在街頭、議會和媒體上煽風點火，甚至遠渡重洋要求外國介入。理由是一旦通過修例，以後內地便隨意捉拿香港居民，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這樣的戲碼想必大家相當熟悉。去年審議西九龍高鐵「一地兩檢」時，反對派就用這套

說辭危言聳聽，可是今天西九龍出入境人數已突破1,000萬人次，反對派口中破壞香港法治的事情沒有半點影子。

今年初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甫出台，反對派又詭譎香港「被規劃」。足證這些政客和大狀，根本不分是非曲直，只要某件事情和內地相關聯，他們就會露出「逢中必反」的面目，刻意將鋒水潑向中央和內地。這次他們故伎重施，將修訂逃犯條例與內地掛鉤，無非重演「逢中必反」的鬧劇。

此次特區政府提出修例，反對派都認同並非中央授意，純粹是政府履行管治之責。然而反對派死性不改，為了達到反中央反政府的目的，寧讓法律有漏洞，不惜殺人殺人犯。筆者無意再詳細列述內地近年來法治水平已取得明顯進步，亦已與法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一眾港人認為法治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逃犯移交的協議，並有相當成功的合作案例。

筆者只想闡述一個簡單淺顯的道理：確保「一國兩制」不會變、不動搖是中央的堅定承諾。回歸已近

22年，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成功落實，國際社會公認，更是700多萬香港同胞的切身感受。只要大家堅信中央繼續實施「一國兩制」，毫無必要擔心修訂條例會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

反對派閉目塞聽，不相信中央落實「一國兩制」的決心和誠意，那麼以反修例來防止所謂中央「破壞」香港法治純屬多餘。試問，中央真的如反對派所言，要棄「一國兩制」不顧的話，又豈是這些條例改或不改所能約束得了的？反對派冀望「逢中必反」的把戲還能奏效，未免太低估港人的理性和智慧。

奉勸反對修例的人，那些作奸犯科又逍遙法外的人，正在為你們搖旗吶喊。他們害怕修例，怕惡有惡報，怕多行不義必自斃，怕法治和正義得到彰顯。一旦你們的反對圖謀得逞，他們就安心了。可是，面對死者九泉之下的冤魂和家屬肝腸寸斷的悲痛，你們的良心不會痛嗎？將心比心，如果你們是受害者的家屬，還會這樣顛倒黑白嗎？

香港是購物天堂、美食天堂，但絕不應是「逃犯天堂」。

工商界要搶閘進入大灣區投資



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

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鼓勵工商界要到大灣區投資發展，指大灣區規劃綱要明確將香港列為大灣區四大中心城市首位，大灣區建設香港「主場」色彩、「主角」地位十分明確，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發展創造「新空間、新動能、新福祉」。他的講話針對了香港經濟動力不足的現實，讓香港工商界擴大了視野，看到了黃金機遇所在，有利於企業擴張和升級。

香港面對着5G流動互聯網與實體經濟結合，人工智能滲透到製造業、銀行業、商業貿易、教育、生活領域的第四次科學革命的新時代，這個時代將會推動生產力像火山一樣爆發，帶來地區經濟的競爭力跨越式上升，而且這些高科技和產業，需要國家一級的力量去推動，也需要擁有巨大的人口數量，需要投入以萬億計的資金。

香港有一句俗話：「high-tech 指嘢」，影響着工商界。意思是說，工商界不要投資於高科技，一定嚴重虧損。這一句說話如果只局限在香港地域，那是對的。然而，這一句也嚴重地拖住了香港經濟升級的步伐。其要害在於，香港高科技發展不能只局限在700萬人的市場，一定要着眼於14億人口的內地市場，着眼於47億人口的「一帶一路」的龐大市場。香港的工商界如果變換思維角度，就會有做不完的生意，經濟體積就有10倍和100倍的發展。

「High-tech，一定撈嘢」，這是香港發揮「一國兩制」巨大優勢的必然結果。「一國兩制」給予我們巨大的市場、巨大的科技基礎、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，國家還把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龍頭城市，要我們擔任主場、主角，可以說是香港兼得天時地利人和，時不我待，一定要全力投資大灣區。

投資大灣區有兩個領域：第一、投入高科技行業，與內地的企業進行合作，港方利用國際聯繫、物色科技人才、開拓國際市場，並且將科技發明盡快建成高質量的產品，銷往全世界，如香港的家長願意投資數以百萬港元計於子女的教育，今後區塊鏈科技必然滲透到教育領域，會出現點對點的根據學生個人需要的補習活動，生意規模龐大。

第二、投資為大灣區的城市提供服務。這不只包括了銀行業、旅遊業、電子商貿業、飲食業、高級的商業服務業、會計業、法律服務，有關的服務還可以把「一帶一路」的龐大市場和大灣區的企業向外發展，聯繫起來，發展債券、公募基金、私募基金、大宗商品期貨、個人理財產品、各式各樣的保險業務和人民幣再保險業務。

大灣區是一個巨型的地產，等待香港工商界和專業界去掘取，早啟動就容易佔據市場。如果等外國的企業也進入了，那就遲來一步，好的位置都給別人佔領了，希望香港工商界一定要提早起步，千萬不要執輸。



謝曉虹 全國青聯委員 香港青賢智匯主席 香港菁英會執委

「佔中」發起人戴耀廷等9人被判罪成。「佔中」案的判決，彰顯了香港仍然是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。法官清楚指出，公民抗命並不是刑事控罪的抗辯理由，違法者最終需要承擔法律責任。法官亦清楚表示，控罪不會構成寒蟬效應，不會阻礙社會發表合法言論。

自「佔中」以來，香港的法治和管治曾遭到嚴重挑戰，外部勢力明目張膽介入，暴力事件不斷升級，香港經濟蒙受損失，更有不少家人朋友因政治立場不同而關係惡化，社會嚴重撕裂。更有部分青年走向極端激進，受「港獨」誤導，引發宣誓風波，嚴重破壞「一國兩制」。

記得「佔中」前夕，曾發生由少數學生策劃的罷課，筆者當年寫了題為《十問罷課為什麼》的文章，呼籲青年莫做後悔終生的事。「佔中」從頭到尾，有學生被捲入其中，扮演棋子角色，當時學聯成員甚至和政府官員「討價還價」談判，風頭一時無兩。如今，部分學聯成員及抗爭青年面對法庭的判刑，終需為過去的所作所為承擔法律責任，付出沉重代價。

年輕人爭取民主自由本是合理，但可惜，「真普選」、「公民抗命」根本是偽命題，因為從一開始已經違反基本法和香港法律，「愛與和平」、「公民抗命」等口號，再漂亮再高尚，都遮蓋不了違法的事實。

我相信，「佔中」案的判決，讓香港青年上了一個寶貴的法治及人生課。廣大青年學生是時候思考，我們應該用寶貴的青春建設一個美好香港，還是繼續內耗破壞，讓香港停滯不前？

「佔中」案判決值得香港青年深思



隨着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的出台，香港的「一國兩制」實踐開闢了新的征程。大灣區建設為粵港澳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，「一國兩制」下，灣區城市如何錯位發展，港澳和內地如何化區隔為融合，這些問題頗費思量，粵港澳三地智庫應加強合作，透過建立全新的大灣區智庫合作平台，為新時代的粵港澳發展出謀獻策。

不可迴避「同城化」挑戰

大灣區建設以融合發展作為政策主軸。香港與內地「同城化」發展，將成為港人不可迴避的命題。新型的大灣區智庫平台，應明確戰略功能的定位：立足灣區，協助解決問題，推動錯位發展。

「同城化」意味着城市間突破彼此的行政分割和保護主義，透過促進協作規劃，構建聯合都會圈。大灣區城市最大的優勢是其多元性和開放性。香港、澳門和廣東省9個城市各有優勢，這種互鑒性賦予智庫

發展天獨厚的機遇。加上當下的香港貧富差距加劇，青年向上流動難，土地不足樓價高企，「同城化」發展正好是香港擺脫困境的新出路。

不過，大灣區涵蓋「一國、兩制、三貨幣、三稅區」，灣區城市共融發展，不能失去自我。再者，雖然內地已推出系列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生活的措施，但一些結構性制度問題尚未解決。新型大灣區智庫必須須聚焦這些挑戰，透過加大在經濟、法律、醫療、民生、教育等領域對接的深入研究，提出政策建議，協助消除因「同城化」發展引起的挑戰與問題。

確立前瞻性政策參考

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具有前瞻性的發展規劃，有人擔心，香港與內地融合猶如「溫水煮青蛙」，甚至將慢慢消解香港的制度特殊性。

一個好的智庫，應與政府政策保持一定距離，不被利益集團綁架，更不能成為政府政策的「傳聲筒」。新型的灣區智庫必須回歸到這一本質上來，以

前瞻性、針對性的研究成果作為政策參考。

大灣區智庫平台可以涵蓋多個領域，例如學術智庫、企業智庫、社會智庫等。在堅持決策研究和基礎理論研究的前提下，透過吸納不同領域的專才搭建政府與市民間的橋樑，並為政府決策提供政策建議和依據論證。

粵港澳大灣區與「一帶一路」已成為兩個相輔相成的雙軌道，如果能同時把握兩者的機遇，粵港澳城市發展的潛力將大大增加。新型的大灣區智庫應不僅僅服務於灣區城市和政府決策，更要面向世界，打造全球化視野，增加在國際社會的話語權，說好中國故事。

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駛入快車道，但城市間很多制度上的協同問題仍未解決，這正正是新型大灣區智庫的新契機。灣區城市如何合作構建具有國際化視野的灣區智庫？如何有效發揮「一帶一路」樞紐的重要角色？如何為灣區未來的發展開創全新模式？這是考驗，更是機遇。